

楚文化研究会 编

# 楚文化研究论集

第四集



083

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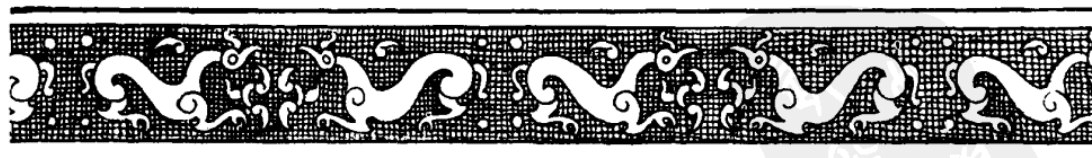
1

河南人民出版社

第四集

楚文化研究論集

楚文化研究会 编



河南人民出版社

知所  
PDG

(豫)新登字01号

责任编辑 张继红

**楚文化研究论集（第四集）**

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郑州市京广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23.25印张 577千字

1994年6月第1版 1994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0,00册

ISBN7-215-03240-X/K·483

---

定 价 17.60元



## 目 录

- 考古学理论的进步与楚文化研究的历史前景…………… 俞伟超(1)
- 再论早期楚都丹阳地望——与南漳说商榷…………… 石 泉(10)
- 豫西南与楚文化…………… 张正明(22)
- 荆山与丹阳…………… 刘士莪 黄尚明(28)
- 从楚人初期活动看丹阳之所在…………… 赵世纲(37)
- 关于楚都丹阳的几个问题…………… 许天申(51)
- 浅析楚都丹阳地望…………… 鞠 辉(59)
- 楚都丹阳地望新探…………… 周光林 郭云进(64)
- 楚都丹阳地望管见…………… 李玉山(80)
- 襄阳楚墓与楚都丹阳…………… 杨权喜(89)
- 楚都纪南城与中原诸国都城之比较…………… 冯秋生(98)
- 楚器使用礼制考…………… 高崇文(104)
- 淅川下寺楚墓年代与布局之研讨…………… 李先登(115)
- 淅川和尚岭春秋楚墓考…………… 曹桂岑(121)
- 浅谈淅川楚文化的几个问题…………… 杨肇清(128)
- 试论淅川境内的小型楚墓…………… 胡永庆(134)
- 试论黄栋树类型及与先楚文化的关系…………… 张居中(143)
- 论寿枕与楚王室之关系兼论其族源…………… 李 瑾(155)
- 关于探索早期楚文化的反思…………… 王红星(184)
- 中原文化与楚文化关系三题…………… 王兵翔 葛 操(191)
- 西周早期楚文化寻觅…………… 马世之(199)
- 丹江流域楚文化试探…………… 张西焕 张西显(206)
- 楚国的北疆及其对中原文化的影响…………… 李绍连(213)
- 从考古发现谈河南境内楚文化的问题…………… 孙广清(223)
- 淮河上游古城古国考…………… 张志清(236)

楚长城西段考·····	柴中庆(252)
浅论楚方城·····	张卓远(260)
湖南楚墓分区探索·····	郭伟民(269)
楚黔中地及其晚期墓葬的初步考察·····	贺刚(282)
东周时期楚国高级贵族墓地剖析·····	朱俊英 张万高(302)
楚墓悬底棺新析·····	曹传松(315)
关于包山二号楚墓椁室的定名问题·····	陈伟(324)
安徽楚墓概述·····	宫希成(331)
安徽六安地区楚文化综述·····	杨德标(340)
南阳宛城建置考·····	王建中(348)
楚申、息之师考·····	尹俊敏(361)
南阳之申在西周时期的战略地位·····	魏仁华 吴湛(368)
丁儿盖鼎与应国存亡问题·····	刘绍明(379)
邓国、楚国关系初探·····	张祖耀(385)
试论楚熊渠称王事所涉及到的历史地望问题·····	叶植(395)
试论韩与楚文化的关系·····	蔡全法(406)
从葬制看楚文化与中原文化的关系·····	龙京沙(419)
楚式鬲及其起源·····	郭胜斌(430)
湘西北出土巴式铜器考略·····	杨启乾(446)
试论西周时期汉东地区的柱足鬲·····	杨宝成(460)
楚式小口鬲源流考·····	谭远辉(469)
春秋时期楚鼎研究·····	万全文(479)
简述浙川下寺春秋楚墓的青铜铸造工艺·····	张剑(490)
从几项科技成就看楚文化与中原文化的关系·····	后德俊(498)
试论寿县楚王墓二号大鼎铸造技艺·····	吴兴汉(505)
包山楚简所见“爵称”述考·····	胡雅丽(511)
楚文字中所见楚史资料辑考·····	李立芳(519)
楚爰金非流通货币·····	陆勤毅 姚芳(530)

信阳楚墓出土屈篛编钟新读·····	郝本性 (537)
楚画楚俗对南阳画像石的影响·····	赵成甫 (543)
楚文物中龙形象及寓意辨析·····	王从礼 (552)
楚辞妇女生活二题·····	胡庆伟 (569)
楚帛书出土五十周年纪论·····	刘彬徽 (577)
楚国神话初论·····	夏志峰 (585)
楚帛书与中国创世纪神话·····	院文清 (597)
楚式家俱概述·····	张吟午 (608)
南阳市西关商业公司三座春秋墓的年代·····	贾付军 (622)
土伯新探·····	刘玉生 王卫国 (628)
西周时楚“至于鄂”非“东鄂”·····	冯少龙 (637)
楚舞渊源新探·····	李伟男 (650)
从《楚辞》看楚文化的渊源·····	宋秀兰 汤丽萍 (661)
包山二号楚墓竹简卦画初探·····	许道胜 (668)
十年回顾与展望·····	谭维四 (687)
后记·····	(693)

# 考古学理论的进步与楚文化研究的历史前景

俞伟超

近10多年来,我国有一系列重大发现,出现了许多新的重要的研究课题,其中就有楚文化的研究。大量的具体研究成果总会引导出一些新的理论思考,甚至是理论思维的新途径或新方式,而这种新的思维方式的出现和成熟又总是会经过一个或长或短的令人苦恼的过程。就整个中国考古学研究的范畴来说,这种困惑已经发生了。对楚文化研究来说,这种困惑或迟或早也是会强烈起来的。我想,任何学科的进步,都是在一定的理论基点上起步的;理论基点有了提高,各种研究就会进入一个新的层次。所以,为了楚文化研究能取得更好的进步,我们应该回顾和归纳一下70年代中期以来所取得的主要进展及其研究的理论基点,同时把这种研究和世界范围内的考古学理论进步加以比较。有了这样的认识,我们对今后楚文化研究的前景,也许就可以得到一个比较客观的估计。

正是出于这种愿望,下面就从三个方面讲一点看法。

## 一、70年代中期以来楚文化研究的主要进步

在近20年的时间内,楚文化研究所取得的进步,可谓头绪众多。但为了说明它的主要进步,必须加以概括。我现在概括为五个方面。为了叙述,就会有顺序。有些顺序是因本身存在的因果关系而排定的,但总起来讲却又是互有因果关系的。

## 1、关于楚文化概念的明确

要进行楚文化研究，首要的理论基础是必须明确什么是楚文化这个基本概念。

楚文化这个名词，很早就出现在史学研究中。但在考古学研究中真正对这个概念进行讨论，却始于1980年在武汉召开的中国考古学会的第二次年会。在这次会上，夏鼐先生和苏秉琦先生都对楚文化这个概念，发表了自己的意见；在1981年的楚文化研究会的成立大会上，我也发表了意见。这些意见，并没有太大的原则性区别，都认为应从时间、空间及文化特征诸方面来规定楚文化的界限，其中，文化特征是最重要的。

在整个中国考古学的研究中，楚文化概念的提出，要晚于商文化、周文化、夏文化概念的提出。把历史上某一民族文化的概念同具体的考古学遗存结合起来，一直存在着认识上的分歧。在很长时间内，特别是在70年代末以前，许多人甚至没有把文化特征当作确定其文化性质的主要方面来看待。但是通过70年代对夏文化的讨论，已有愈来愈多的人达到了这个认识。所以，有关楚文化的概念，自从1980年提出以后，并未发生很大争论而取得了基本一致的认识。当然，当时整个中国考古学界，都把器物的形态特征视为考古学文化的主要内涵，所以此后大家基本上也是从器物的形态特征方面来观察楚文化的形成、发展、变迁及其和其它文化的关系的。自80年代以来，大家就是根据这种观念来探索楚文化的渊源及其变化过程的，而这两方面的探索几乎是同时并进的。

## 2、西周晚期以后楚墓年代学的基本建立

任何考古学文化的研究，排出它的年代表可说是第一步基础工作。许多考古学文化的研究史，正说明大家都是这样来考虑的。

在考古学遗存中，墓葬材料的组合关系比较简单，所以在年代学的研究中，一般讲是墓葬的分期工作进行得比较系统。对楚文化的年代学研究中，也是首先建立起了楚墓的分期序列。



1957年出版的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写的《长沙发掘报告》，首先开始了这方面的研究。1959年发表的湖南省博物馆编写的《长沙楚墓》一文（《考古学报》1959年第1期）继续作了研究。以后，湖南、湖北等地的同志还一直对一些新发现的楚墓，进行个别的断代研究。但总起来讲，由于当时对年代学研究的理论思考还很粗略，也由于材料不足，楚墓的年代学研究此时并不系统，具体结论也往往难免不准确。

到了80年代初，这种研究有了大进步。那时，因为湖北当阳赵家湖和江陵雨台山的发掘，得到了800座左右的自西周晚期至公元前278年白起拔郢以前的楚墓材料，有了建立起那段时间的楚墓分期系列的资料基础；另外，对考古类型学此时也已有了更为细致的认识，于是，从1980年冬开始，就对赵家湖进行了一种先按墓葬的整体规格进行分类，再逐类进行分期，最后又排列各类各期墓葬在年代上的对应关系的工作。由此而得到的最大收获是看到了当时社会不同阶层葬俗变化的不平衡性，并可从而思索它反映的社会历史意义。赵家湖楚墓分类、分期工作的最大价值，在于已把类型学的研究纳入到社会史研究的范畴。如果仅就分期、断代的意义而言，建立了这个楚墓分期的基础之后，也就很容易理解安徽寿县一带战国晚期楚墓在形态学上的合理位置，并得到了寻找西周中期以前的楚文化遗存的器物形态学上的可靠基点。可以讲，自从排出了赵家湖及雨台山的楚墓的年代序列以后，不论何地的楚墓，一看就会知道是什么时代的。所以，至少对于西周晚期以后的楚墓来说，其年代学已经基本建立起来了。

### 3、开始了寻找楚文化渊源的工作

关于楚文化的来源问题，从30年代起已经在古史或金文研究中被提出来了。但是从考古学上来真正探索这个问题，却要迟到80年代才开始。那是因为考古学中的楚文化的概念，要到80年代的才明确。明确了这个概念，才有可能从已经认识的楚文化遗存为基点，往上追溯其渊源。

关于楚文化渊源的探索，湖北省、宜昌地区、荆州地区的考古工作者和北京大学、武汉大学考古专业的师生，曾在80年代前半期于鄂西等地作了五六年时间的专门探索。大家以赵家湖西周晚期楚墓的遗存为基点，往上追索。他们跑遍了沮漳河两岸，包括荆州地区西部以及三峡的许多地点。如果以器物形态学为依据，则可以肯定楚文化遗存在这一带可以上推到西周中期；属于西周早期的遗存，仅个别地点有发现（如松枝博宇山，或称苦竹寺）。正因如此，在鄂西一带探索楚文化渊源的工作就暂时搁浅了。

河南南阳地区的考古工作者，在本地区进行过相当普遍的考古调查。从整体情况观察，这一带商时期的文化面貌，缺乏长江中游的影响，也看不出东方文化的因素，而是以商文化的影响为突出。可以肯定为西周前期的文化面貌，现在还认识不清。淅川境内个别地点的遗存，有可能属于这个时期，有些陶器也带有一定的楚文化的特点，但毕竟材料太少，难以作出比较具体的推测。

所以，有关楚文化渊源的探索，目前正处在迷惑不清的困境。这就可能迫使大家去寻找新的思路来探索楚文化的形成过程。

在80年代初刚刚探索楚文化的渊源时，认识是很简单的。大家往往以为这个文化会是一脉相承的，西周晚期的楚文化面貌既然已经清楚，就可以一步步地直接找它的前身，直至新石器时代。但如果无限地上溯，岂不就将到达人类的起源时期？当然不能这样来思考。于是，就把五六千年以前的新石器时代文化作为寻找的上限，我还写过《楚文化的渊源和三苗文化的考古学推测》一文（见《先秦两汉考古学论集》，文物出版社，1985）。但在追索楚文化渊源过程中不断遇到的文化中断、空白和突变现象，终于使我慢慢领会到西周以后存在于长江中游的楚文化，大约是有多种文化因某些历史的因缘或机遇而在一段不很长的时间内综合而成的。如果仅作单一连续线的观察，有可能将永远找不到楚文化的源头。假如从这种思路出发来考虑，则最初的楚文化，便可能包括本地的土著文化（如果形成于鄂西，这便是江陵荆南寺、沙

市周梁玉桥那种商时期的遗存)、早周文化（鬻熊曾为文王师，那时的楚文化理应受到早周文化的影响）等文化的因素。由于荆南寺和周梁玉桥的遗存本身又包括了具有石家河文化（或称湖北龙山文化）传统的土著文化以及商文化、三峡青铜文化和南方的几何印纹陶文化等多种文化因素，楚文化的源头实际是更加复杂的。具有如此众多源头的楚文化，如果和本地原有的文化相比，恐将面貌一新，堪称为是一种新出现的文化。

所以，关于楚文化渊源问题的解决，并不仅仅在于考古发现，还需要思路、观察角度和分析方法的更新。也就是说，即使解决问题的材料已经具备，如果不能作出合理的解释，也将永远不得真相。

#### 4、文化因素分析法的广泛运用

据现有发现，即使在远古的旧石器时代，各地的考古学文化就是起源不一。在上面讲的楚文化形成的问题中，也阐述了楚文化源头的多样性。在两周时期的楚文化发现过程中，更是不断地涌入过许多其它的文化因素。所以，要正确地研究楚文化的发展过程，必须运用文化因素分析法。

就此方法的实质而言，如果所谓的文化因素主要是指器物特征的表现的文化属性，那也就是一种类型学的分析方法，不过是扩大了视野，把它运用到分析某一考古学文化所包含的其它文化因素的方面。实际上，当这种方法的理论概念形成以前，人们在研究各种考古学文化的相互关系时，已经不同程度地运用了这种方法，所以在我国的类型学研究建立起了“区、系、类型”理论以后，就很自然地概括出了这种方法。

1981年发表的李伯谦同志的《试论吴城文化》（《文物集刊》第3集，文物出版社），已经运用了这种方法。1985年6月，我在楚文化研究会的第三次年会上，则就这种方法讲了一些略有系统的看法，正式提出了文化因素分析法的概念（《楚文化的研究与文化因素的分析》，《楚文化研究论集》第一集，荆楚书社，1987

年)。接着，李伯谦同志于同年 11 月又在山西侯马召开的晋文化研究座谈会上，讲了《晋文化研究中如何运用文化因素分析方法的问题》。显然，那时这种方法已经成熟了，因而以后就迅速被许多人所运用。

正因运用这种方法的日益普遍，使得划分楚文化内部的区域类型的研究，并能迅速开展起来；若干楚国古器物的形态学研究，也深入探讨了与其它文化的关系。可以认为，文化因素分析方法的成熟及其逐渐普及，是近十年来楚文化研究方法的一个基础性进步。

### 5、关于楚国都城的探索

对于楚国都城的探索，无疑是楚文化研究中大家最关心的问题。史载楚国最初都于丹阳，楚武王时迁郢，白起拔郢后迁都于陈，后又东迁于安徽境内，最后定都于寿春被秦所灭。在这些都城中，丹阳至今无足迹可寻；50 年代时在江陵找到的纪南城，长期被认为是春秋初期以后的郢都；陈及寿春的城址在 80 年代时也被确定下来。自 70 年代至 80 年代，又对纪南城进行了多次发掘，确定了此城实为战国时期所建。于是，春秋时期的楚都究竟在哪里，突然成为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

关于丹阳及郢都的位置，历来就存在着差异很大的说法，现在也依然争论不止。但是，通过纪南城的发掘，战国时期楚都的城门、宫殿基址、一般建筑物的特点，已经得到了初步了解。所以，西周的丹阳及春秋时的郢都虽然仍未确定下来，但对于楚国都城遗址的探索，无论如何也应该看作是楚文化研究中的一种重要成果。

对都城探索的重视，当然不能意味着对一般城市研究的忽视。自 60 年代至 70 年代于纪南城以西约 40 公里的范围内所找到的同时期的万城和季家湖古城，即使仅就纪南城本身的研究来说，也有重要意义。因为在那个时期，竟然在 40 公里的范围内，同时存在着 3 座城市。这在考虑它们所反映的人文地理意义方面，显然

具有重要价值。德国学者对于古代城市的研究，曾从人文地理学的角度，提出一种选择交通距离最短而取得能源最为方便的六角形分布的理论。对楚国古城的研究，也应该从这种宏观的角度，对城市生活同周围自然环境的关系以及人文需要等方面，进行多学科的综合考察。

上面所讲的五点，便是近一二十年来在楚文化的考古学研究中取得的最主要的进步。这些成果的得到，当然基于大量具体工作的积累，但更重要的却在于理论、方法的提高。

## 二、国际范围内 60 年代以后考古学理论的进步

二次大战以后，科学技术有重大进步，社会科学的思潮也发生很大变化。这两方面都对考古学研究发生很大影响。前者首先表现在对古代遗存的年代确定方面，接着并突出表现为愈来愈深入地研究环境对于形成古代人类文化特征的制约作用方面。后者则集中表现为扩大了考古学文化这一概念的范畴。说得具体一点，也就是过去的考古学家是把器物、建筑物、墓葬等物的形态特征及其组合，当作考古学文化的主要内涵，人们可以根据这些特征及其组合的变化，查明考古学文化的发展序列以及各考古学文化的相互影响乃至其迁徙过程；而现在，则认为考古学文化应当包括物质的（或称技术的）、精神的（或称意识的、观念的）、社会的三大方面。这样，研究考古学文化，不仅可以了解过去人们族群的发展、变化、迁徙过程，还可以探讨古人意识形态和社会关系的变化。由此而引起的深刻思索是，环境、技术、意识和人们的社会关系究竟存在什么相互影响？这实际已迫使考古学家不得不作哲学的思考。60 年代在美国首先出现的“新考古学”，就总体而言，其哲学基础是文化唯物主义，他们引入文化人类学中的适应性理论，认为古代人类文化的特征所以是这样或那样，是为了适应环境。他们的研究内容，不仅在于归纳出考古学文化的具体特征，还要探索古人的行为过程，乃至其文化发展的规则与动力。

其研究方法，则已不仅使用归纳法，还应用了演绎法。到 80 年代中期以后，更出现了一种强调古人主观意图对其行为发生重大影响的“后过程主义”理论，尤其重视探讨考古学遗存中包含的有关意识活动的内容。

就考古学发展的全过程来看，自 19 世纪中期至本世纪中叶，考古学研究的主要内容是记录已发现的古代遗存，排列出它们的序列，重新恢复已被人们忘却了的人类已逝生活的具体内容。到 60 年代以后，则在努力解释已发现的古代遗存，寻找其发展规律。如果放在社会科学的整体环境中来观察，则我们又会感觉到当 19 世纪中期考古学刚刚出现时，考古学家最关心的问题，例如从猿到人，从石器时代到青铜时代到铁器时代等问题，也是哲学家、社会科学家最为关心的问题；但在以后近百年的过程中，考古学家由于花费了最大精力去研究各种具体问题，却好像渐渐不关心社会科学热衷讨论的问题；而现在，则又重新研究社会科学中的重大问题，开始向社会科学的大家庭回归了。

参与的学科在日益增多，研究内容的本质却在返本归朴，是二次大战以后考古学进步的趋势。

### 三、楚文化研究的历史前景

预测科学发展的前景是有可能的，但也是极为困难的。对楚文化研究前景的估计，当然也是这样。

如果参照世界考古学发展的过程来考虑，已有的楚文化的考古学研究，主要还是从取得考古学遗存的资料，并根据形态学的研究来建立其发展序列，探索其技术进步这几个方面来进行的，大体上还处于考古学的记录阶段。今后，自然也应当扩大楚文化的范畴，从技术的、精神的、社会的三方面来进行研究和解释。

1978 年冬，我在武汉举行的楚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上，曾提出了应该进行楚文化的整体研究这一设想；其中，特别强调了要注意意识领域的研究。听说，那时有不少从事楚文化的考古学探

索的朋友，以为这种说法未免太玄了。其实，在世界范围内，对于许多考古学文化的探索来说，已经这样做了。

事实上，从80年代以来，在楚文化的考古学研究中，已经开始了有关精神领域和社会关系的探索。即使今天不明确提出要从整体角度来研究楚文化，客观的趋势也还在向这个方面前进。但是，如果我们明确意识到这一点，则必将加快这个进程，并且可以使整个社会科学界来关心楚文化的研究，扩大楚文化研究的队伍，最终使楚文化的研究能很好地为现实世界服务。

科学进步的轨道是客观的。为了能比较清醒地认识到这条轨道，我们应当努力观察全世界的科学进程。我今天所作的有关楚文化研究在近十多年来的进步及其与国际考古学研究进步的简单比较，就是为了寻找合理的前景方向。是否妥当，请大家指正。

# 再论早期楚都丹阳地望 ——与“南漳说”商榷 〔详细提纲〕

石 泉

1. 早期楚都丹阳究在今何处？学术界始终意见不一，以秭归说、枝江说、先秭归后枝江说及淅川说较盛。

2. 我支持淅川说，但又有补充与发展，提出了先商县后淅川说，已发表《楚都丹阳地望新探》（与徐德宽同志合写，见《江汉论坛》1983年3期，以下简称“《丹阳新探》”）、《楚都丹阳及古荆山在淅川附近补证》（见《江汉论坛》1985年12期，以下简称补证”）二文，作了考释。后皆收入《古代荆楚地理新探》（武汉大学出版社1988年10月版。以下简称《新探》），分别见174—199页、200—210页，内容作了一些修订补充，请参阅。

3. 近年又新出现南漳说，其较有影响的代表作，为《楚文化源流新证》（王光镐著，武汉大学出版社1988年11月版，以下简称“王书”）的下编《丹阳·郢都考》前三章（275—376页，特别是第二章《判定楚丹阳地望的若干标准》〔308—339页〕及第三章《楚丹阳地望辩证》第4—9节〔352—376页〕），及《熊绎所居丹阳考》（张正明、喻宗汉作，发表于《楚学论丛》〔以下简称“《论丛》”〕，《江汉论坛》编辑部1990年9月版，8—21页，以下简称“张文”。后文所举页数，为《论丛》总页数）。



## 一、南漳说的主要论据和我们的商榷意见

1. 楚熊绎所居丹阳附近必有荆山。依据《楚世家》所记熊绎受封后，“居丹阳”；及《左传》昭公十二年楚右尹子革回答楚灵王：“昔我先生熊绎辟在荆山，筓露蓝缕，以处草莽，跋涉山林，以事天子，……以共御王事”，而认为熊绎之楚国当时为子男小国，因而其所居之丹阳，与所开辟的荆山，必相邻近。王书进而依据《三国志·周瑜传》裴松之注引《江表传》所记周瑜曰：“昔楚国初封于荆山之侧，不满百里之地。……”，更加强了熊绎所居丹阳必近荆山之证（见王书 313—316 页）。这一点，我们是同意的。

### 2. 荆山的位置和我们的商榷意见：

(1) 张文认为，“这里所谓荆山应即《尚书·禹贡》所谓‘南条荆山’，亦即位于今湖北西部偏中的荆山”（见《论丛》9 页），而未作具体论证。王书则对此作了较细致的如下分析：①首先排除了笼统地把今南漳境内大片山区都叫“荆山”的含混说法，并列举了一系列古记载，证明当时所谈的荆山，都是“仅指某特定高山”；而非“今世概念中的‘荆山山脉’或‘广义荆山’”。对此，我们也同意。②然后对于拙作《补证》一文中列举的五个荆山进行了比较分析，结合《尔雅·释地》“汉南曰荆州”之语，认定“作为荆州北界的这一与楚关系密切的荆山，理必在汉水以南”（见王书 317 页）。而这个荆山又是见于《禹贡》、《汉志》和《水经注·漳水篇》，“是南方诸‘荆山’中最古老、显要的一个，按常理，……也应该就是随同楚国历史一起弘扬于天下的荆山，亦即熊绎荆山”（王书 317 页）。

(2) 我们的看法是：①从《禹贡》到《汉志》、《水经》所记荆山地望，只反映战国秦汉时人的地理观念，此时的荆山只能与位于宜城平原上的楚郢都、秦汉江陵城配套，是与荆楚中心地带相去不远的名山，而不再与丹阳（已非楚都）邻近，所以不能据以推定西周时期楚丹阳故都的地望。迄今，在任何古代原始资料